



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

大踏
作品

1976年以后我刚活开，
似与我1976年的
异举没啥关系，多半是因
我1976年不幸中之万幸后
的个人的改革开放。
现在回眸望过去，
我那时一半是傻×一半是牛×。
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
越活越爱活，
越活越觉得离死越远。

——大踏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没有英雄
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
人

大路 作品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 / 大踏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18-08858-7

I. ①没… II. ①大…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2437 号

Meiyou yingxiong de shidai wo zhixiang zuo yige ren

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

大踏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梁茵

监 制: 于向勇 康慨

特约策划: 赵辉

封面设计: 牧牧

营销编辑: 刘菲菲 孙玮婕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8858-7

开 本: 860mm × 1200mm 1/32

印 张: 5.5 字数: 10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我写它的原因，是想回味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是历史，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

虽然无一不真实，但在大的真实面前，有可能因为是局部而显得次要，甚至不真。

序 大踏

陈嘉映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

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看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中看到 he 怎么过日子。大踏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总体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关于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

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了标记。他自己说得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骨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或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倒有点儿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它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

社会”的——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官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此处且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

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 1976 年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更差得很远。要是回到本文一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 1978 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 1976 年了。大踏说他写这书写得好玩，善哉，祝诸君阅读愉快！

2013.3

目录
contents

I 序 大踏 陈嘉映

- 001 匪甲也上花名册
- 004 我被称为“小布衫”
- 009 好胜心作怪，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 014 傻不是罪
- 020 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 025 亮出我的青春大白嗓
- 029 去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 034 玩大了就不好玩了
- 040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除了上班都愉快
- 050 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
- 058 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
- 063 我觉得唐山大地震与我无关
- 067 我的骨头实在缺钙

- 070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 075 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地成了好人
- 082 1978年，父亲摆席接我回家
- 089 工友陈嘉曜把我带进月坛帮
- 098 落第的感觉相当于失恋
- 102 校园里的“四五英雄”比较操蛋
- 110 学子固穷，却美事多端
- 116 大学像春天丰腴的土壤，顽劣、痞赖也因势生长
- 122 月坛帮扩大成黑山扈帮
- 128 大学的生活很疯狂
- 135 客入黑山扈，常携新醉离
- 145 校园竞选，我把自己看走眼了
-
- 153 尾声 1976——我的好运年
- 157 跋 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

匪甲也上花名册

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
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重要新闻，《人民日报》的标题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闻的导语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的首篇官方文章。那时我正在位于花园村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78级一班的，班上80来人，男女各半。我们班年纪小的有16岁的体育特招生，年纪大的有33岁的孕妇。可惜漂亮女生都在78级二班——后男生民意测验也一致认为系花、级花都在二班（校花在外语系）。那时我刚23岁，是当了四年半钳工后考上的，还没交过女朋友。

上大学令人兴奋，可遗憾的是校园中的美女比我原来的工厂少多了——是呵，美女考什么大学呀，直接考一个好丈夫不就得了。各科摸底测验下来，发现女生成绩最好的往往是形貌不及格的。上学伊始，坏学生的坏还没显露，好色的口水也都暂时咽进胃里。大家都按时上课，参加政治学习和校务劳动（学校当局借着新生入学的激情，将一些苦脏累的诸如清除陈年垃圾、挖沟等活儿分派下来），并且多数都自觉地去图书馆或到教室上晚自习。

我就是在晚自习的教室里看到了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6年4月的事到1978年11月，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天安门的事我已淡忘了，并且眼下大学的新生活让我大喜过望：可以不用当受苦受累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而像做梦一样进了校园；大学里除了《金瓶梅》《肉蒲团》等还被视作禁书，什么书都可以借阅，《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多刺激人呀；大学里的舞会“只要你胆丰脸厚”，什么样的女生都不会拒绝你的揽握——大学里好玩的人比工厂里多多了。所以我兴致最大的是要展开并深入我的大学生活，比如我要结交我们班的田

才子田杰，要贼住一个漂亮女生，要读遍外国文学名著。所以“四五”平反，以及我成了“四五英雄”都算不了大事。

不过，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的确是挺好玩的，像是人生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老妻向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而正专注于新爱，比如养鸽子或玩书画或集邮的老夫不会特来劲儿吧。再说“四五事件”后，和别的“四五英雄”相比，我发现我不是特别热衷于政治或革命。我骨子里喜欢玩——当然旅行和文学艺术最好玩了，而我当初参加“四五”除了政治观点的基本好恶，主要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广场咱已经玩完了，那里的好戏也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了，咱现在玩的是大学，且已经进入角色了。

第二天，班里的辅导员李老师和系里的书记就找我谈了话，确认我在入学前的确在报纸上说的那家工厂，的确是参加了“四五事件”。他们赞许我的作为，更称道我的不张扬，又要我给全系做报告。我当时未置可否。

记不清是不是因为校广播报道了我，总之，我在学校有点名了。但这名并不实惠——没有发奖金，我那时零用钱多紧呀，啤酒一周只喝得起限量的一次，跳舞前要用的皮鞋油都是蹭同学的。“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发一个文件：将在普通大学读书的参加过“四五运动”的学生都转到北大、清华去？

我被称为“小布衫”

我们厂22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

1976年4月时，我在特种工艺机械修造厂，那是我在的第三个年头。特艺机修厂属北京二轻局下属的特种工艺公司，该厂约20世纪90年代解体，车间毁平改建商品房。我们厂子，四五百人，3个带天车的长达一百米的大车间，生产一般的车床、铣床、刨床、锯床，以及为加工工艺品特制的机械，如仿型铣。当美丽的天车女工（高空横移吊车司机）为我吊活，按着我的手势操作时，我心说：你在天上真听我的话。我不能老盯着人家的脸，我一师弟就是吊活时精力没集中在铸件上，被倒仄的铸件砸伤了。

那时我刚20岁，肩宽腰细，一米八高，身上的青春之火乱烧，但烧不到女性身上，只能烧到钻研技术努力工作上，烧

到业余的古今中外的文史书上，烧到足羽篮球滑冰游泳上。

那时我们厂 22 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电工班技术最好的一位广东籍师傅，长得英俊又能文擅书法，就因为跟一位姓车的未婚女工有性关系而被判了两年。

更贴切地说，与其说我们青工的欲火不敢瞎放，不如说也不会放。浑身是火呀，我就做了一个不凡的败火活动。从 1975 年底到 1976 年春节后，我只穿单裤和衬衣过冬，并且每天从羊坊店骑车 15 公里至北沙滩上班。在德胜门到清河的路上，我是被称为“小布衫”的人，零下 15 度也依然是这一身衣服。咋不冷！可每天工友掀掀我的衬衣夸我一句“真棒”时，那赞语就像棉袄或是巧克力。穿得少，肯定吃得多，一般早餐仁糖包二两粥，共八两，午餐八两馒头算半饱，晚饭回家足撮一斤半粮食外加菜。我妈说：省了衣服才省了几个钱，你这一冬吃出了好几件皮袄。

当时我要单过冬，还真没有在女工面前招摇的企图，但想当一个优秀的人，比如牛虻、保尔、拉赫美托夫或是写书写诗的作家的心是有的。可那时莫名的性的欲望就像个暗藏在身体里的反革命，老给你捣乱以增加你成为优秀人的难度。

我和几个小青工特看不起机加车间一个因流氓罪判过一年劳教的卢师傅，但却特喜欢听他讲那种事儿，每每听得裆中如

旗杆。一次他讲：我把她带到香山后山的树林摁倒，好不容易扒下她裤子，可她扭来扭去，根本插不进去，我那家伙急了，射了。我身体好，没两分钟，那家伙又起来了。这姓卢的故事可供我们长时间玩味。而他搞的那个女工，也是机加车间二号漂亮的，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哪怕她挺着大肚子时，也面色粉嫩。

工友中我的铁哥们儿不少，尤其是七二届初中毕业的张凯来与赵妍与我最好，也因我们都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呢，现实与理想间的困惑，优美地折磨着我们，我们仨常常秘密地讨论，一头雾水地进去又雾水一头地出来。劳其筋骨好办，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呗，练就身体，攒好革命的本钱。

我们一样都是 1972 年初中毕业后，没有去北京郊区插队，而是被分到了技校——那是特种工艺公司现凑的一个技校，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我们上来就是学徒工，每月挣 16 元。一年半内，每隔三个月就去地安门中学借教室借数理化老师上三个月课，余下时间就在特艺机修厂学徒干活。所以，可以说我从 17 岁已经当工人了，胡子还没长黑，就长大成人挣钱花了。

趁着那年冬天在地安门中学上课的三个月，我们仨坚持冬泳。那是在什刹海南岸，每天中午我们去把冰砸开一条长 20